第一章　社会主义经济学

从全球的视野来看，社会主义经济学——又叫“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是随着 20 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全球社会主义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演变，全球社会主义经济学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学到市场经济学的演变，这个演变用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和发展的完整时期，只是这个演变只用了大约半个世纪。与此相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学到市场经济学的完整演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大致经历了萌芽（1900～1949 年）、曲折探索(1950～1977 年）和繁荣发展(1978 年以来）三个时期。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学萌芽时期

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初探索

进入 20 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作为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然而，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很朦胧。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开始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秀、李达等是主要代表人物。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在马克思之前，也有很多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主张偏于感情，涉于空想，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就是马克思。① 1923 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演讲《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说明了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新型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等。他力求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参照俄国的情况来说明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②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同时，也以苏联经济为对象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沈志远、狄超白、蔡丹华、陈豹隐等。他们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的差别；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必然性；介绍了计划经济的规律性、条件、形式、内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等；指出了解决中国落后的办法就是实行主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

值得一提的是，30 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的焦点在于争辩当时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主要围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来论证何者在中国经济中居于优势地位；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封建势力在中国是否仍然存在；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继续和深入。通过这场争论，认清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这场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接受了锻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

40 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础上，一些

① 参见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76 页。

② 参见张问敏著：《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 5 月版，第 56 页。

经济学家如王亚南、许涤新等研究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多种经济成分，如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等，也介绍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财政经济政策，如土地政策、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劳动政策等。但总体来看，即使是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也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萌芽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特征

萌芽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有：

第一，主要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早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最早也产生于苏联。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他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他们深受苏联人对于社会主义探索的影响，在其著作中也能明显看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痕迹。

第二，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是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也时日尚短，因此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作用的经济规律还没有被充分认识。正因为这样，当时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也就不可能深入，从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

这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具有宣传性和批判性。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勾勒中国将要实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轮廓，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只能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萌芽时期。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学曲折探索时期

一、曲折的发展过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但是，由于政治风云变幻和知识分子命运多舛，所以，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建国初期，从苏联流传进来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上占统治地位。该理论认为，商品生产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市场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对立的。特别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发表以后，更把该书贬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奉为圭臬。

然而,从 1956 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学界频频向主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出挑战，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和主张。 1956 年，孙冶方提出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鲜明主张；① 1957 年,顾准提出可以设想让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自发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价格的自发涨落来调节生产；② 1959 年，于光远提出，凡是加入交换的产品（在交换中要比较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依据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进行），都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③ 1962 年，卓炯（于凤村）提出商品经济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矛盾，还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④ 1963 年，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的

① 见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 年第 6 期。
② 见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
③ 见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 年第 7 期。
④ 见卓炯：《论商品经济》，《经济研究》1962 年第 10 期。

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①

需要指出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经提出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如陈云 1956 年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补充；②毛泽东在 1959 年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③

1964 年以后，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经济理论界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孙冶方等主张的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利润是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综合指标等观点指责为修正主义。接着，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所有过去对于计划和市场关系以及商品生产的探索，均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从而受到了无情的、无休止的口诛笔伐。至“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版）是经济理论包括商品经济理论的大倒退。

1976 年粉碎‘四人帮’至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前，这时主要是清算‘四人帮’的反动谬论，重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价值规律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等，从而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健康发展准备了条件。

二、主要理论探索

“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是多少年来人们不变的信条，也说明所有制和分配理论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但是，这一时期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

首先，从所有制研究看，50 年代初期，所有制研究的重点是新民主主义时期

①见孙冶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写于 1963 年），《孙冶方全集》第 2 卷，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6～364 页。

②见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种经济成分保存的必然性、特征、内部矛盾以及发展趋势。1953 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以后，经济理论界对于所有制问题的研究转移到了论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方面。从整体上来看，经济学界对于所有制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解释上，很少有创新的观点。

但是,即使是这样,从 50 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一些与传统信条相左的论点和看法。1957 年，骆耕漠在分析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时提出了“大全民”和“小全民”的论点，这与以后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国家所有制应该分级所有、分级管理是基本相同的，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集体所有制是“内公外私”的著名论点。① 1958 年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并带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后，在经济学论坛上有不少论著从中国生产力仍然很落后出发，论证集体经济包括小集体经济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民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存在的客观必然性。②

针对当时把所有制仅仅归结于生产资料归属的主流观点，孙冶方、孙尚清、苏绍智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与占有、支配、使用能否分离，或者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问题。③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所有制问题的研究上不仅没有建树，而且在所有制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许多混乱，如“领导权决定所有制的性质”等。即使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里也很少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著。

其次,从分配理论研究看,在 50 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问题主要是介绍其理论内涵，以及如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克服平均主义。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个人物质利益问题却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当时主要讨论了关心劳动者个人利益和发展生产的关系。认识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关心职工物质利益的必要性；只有物质利益原则作为保证，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才能持久；物质

①见骆耕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② 见亦农：《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根本制度》，《经济研究》1961 年第 1 期。

③ 参见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写于 1961 年),《孙冶方全集》第 2 卷，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 年版 孙尚清:《试论社会主义社会质的规定性》,《经济研究》1961 年第 4 期；苏绍智：《试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学术月刊》1962 年第 6 期。

利益原则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50 年代末期至“文化大革命”，经济学家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问题。指出了按劳分配存在的条件和原因，研究了按劳分配的质的规定性。喻良新、徐崇温、薛暮桥、艾思奇等一批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按劳分配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他们或者认为按劳分配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决定，或者认为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力水平决定；或者认为由公有制、生产力水平、“三大差别”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等决定。① 此外，在经济学界还研究了按劳分配中“劳”的内涵、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与物质利益原则的关系等。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舆论工具把重视物质利益斥为修正主义的观点；提出要批判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认为按劳分配会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文革”结束以后，经济学界对于极“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不能把按劳分配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关系上不能大搞平均主义；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等等。

三、总的历史估价

总体来看，1949～1977 年期间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是不寻常的，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和发展的过程。站在 20 世纪末叶来看，理论研究转折颇多、观点反复频繁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首先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4 年在苏联出版，1955 年在中国出版）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带给了中国，也把具有系统体系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带给了中国，为中国培养了一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队伍，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为中国的经济和经济理论注入了许多消极因素。它一度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如贬低商品生产、限制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的

①参见喻良新：《试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大公报》1957年 1月 27 日；徐崇温：《论按劳分配的性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薛暮桥：《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制度》，《人民日报》1959 年 10 月 23 日；艾思奇：《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哲学研究》1958 年第 7期。

作用、指令性计划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消极影响更重要的表现在学风上，其中最重要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唯意志论和不准发表不同意见、把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

由于中国的情况与苏联不同，照抄、照搬别人的模式不能取得成功，所以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发表后，中国的学者才活跃起来。孙冶方、于光远、顾准和卓炯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孙冶方虽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束缚，但在他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中却展现了真知灼见。他以其深邃的目光敏锐地察觉到了传统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缺陷；他最早倡导改革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无畏的探索精神，都得到人们的尊敬。于光远以他渊博的知识，对社会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探索，拓宽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他提出宽泛的商品生产观（共产主义也存在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不是社会主义的惟一分配原则的观点。顾准则在中国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就指出计划经济的弊病，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价格等手段来管理经济，让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节生产。卓炯则一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提法，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商品经济。①

站在20世纪末叶回顾历史，应该对那时在恶劣的环境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先辈们予以崇高的敬意，并客观全面地评价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干扰，又囿于唯上和唯书，有创意的经济学家连遭厄运，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经济理论研究的大倒退。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学繁荣发展时期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经

①参见张问敏著：《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397页。

济学界思想越来越活跃。不断突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条条框框，大胆吸收当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寻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性，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学界此阶段迎来了理论研究的春天，社会主义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辉煌时期。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1979年4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了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在会上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有几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 (2)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竞争是其内在机制。(3)企业是独立的或者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主张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4)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1982年前后，经济学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论争。刘国光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观点。[①] 这个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结论，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从而，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被认为是一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成为人们的共识。

到了80年代后半期，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明确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市场化的改革。内容包括：企业应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建立和发展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要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等等。1986年，有文章认为，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模

①见刘国光：《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人民日报》1982年9月6日。

式主要是国家掌握市场（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市场参数调节供需，实现对于市场的“领导权”),市场引导企业,或者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①] 到了 90 年代初，吴敬琏等明确提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对新体制的框架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②]

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对于市场经济的看法。他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 同年 9 月，党的十四大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对于经济改革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经验的丰富而日益充实和发展。逐步出现系统描述和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的学科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陈东琪、李茂生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5、1997、2000 年版）。

回顾经济学界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把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计划和市场说成是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志，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认识完全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制定各种经济发展计划，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而实行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则因贬低和排斥市场的作用，窒息了经济的生机和活力，以致在和平经济竞赛中败北。事实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借助于市场，才能重新激活被指令性计划捆死了手脚的经济活动；只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①见李成瑞：《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若干问题》，《财贸经济》1986 年第 11 期 汪积业：《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国计划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见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用，才能提高经济效率。

其次，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科学阐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这个难题的解决，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互适应、相互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科学技术进步加速、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只有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振兴中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以经济的辉煌业绩来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与成熟，从而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学大厦。

再次，转轨经济学或者过渡经济学，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转轨经济学或者过渡经济学也是以论述从计划主导型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迄今为止，只有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经验和规律性最具有典型意义。揭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规律性，将为当代经济科学增添新的篇章，从而丰富和发展当代的经济科学。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还在探索之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全新的理论体系，它既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素材和养料，也需要经济学家的艰辛探索和理论概括，又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真理被多数人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学术研究上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是经济学家由衷的追求，这也是防止扼杀真理、避免坚持真理者悲剧重演的重要保证。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怎样在中国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一直是人们经常碰到并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中国经过 30 年的探索，直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才取得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识。以后，这一共识又逐步深化，使人们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从长期在幻想中漫游回到现实中来，并获得健康和快速的发展。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又一重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成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是，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期间要经历 100年的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通过经济的社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工业化和走向现代化，变二元经济结构为现代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学界和理论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什么阶段作过不少探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过重要的贡献。王学文、杨献珍、王亚南等都从不同的侧面论述过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问题。①“文化大革命”后，经济学界对中国处于什么阶段的研究才真正活跃起来。1979 年，苏绍智、冯兰瑞率先发表文章，坦言中国并未真正建成社会主义，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②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 80 年代初专门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一书，③ 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该书于 1997 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专家论证委员会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不仅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党和政府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1981 年，在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 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1997 年党的十五大又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的最基本的国情，进一步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分别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就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在中国的条件下

① 见王学文：《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4 年 12 月号；杨献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载杨献珍等：《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战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王亚南：《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1959 年 5 月 15 日。

② 见苏绍智、冯兰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研究》1979 年第 5 期。

③见于光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 年版。

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的道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使我们懂得了今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首先，既然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就应该长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保证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中国又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远未达到可以全面实现公有化的程度（未来能否达到尚未可知），而必须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其次，既然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就要着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社会经济关系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才能走向现代化。企图越过商品化、生产化，实现现代化，没有一个能成功。

再次，既然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就要十分注意重视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过渡。当前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国际经济竞争突出地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国在推进产业升级时，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的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建国 50 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最重要、最突出的成果，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两大支柱。现阶段中国一切经济问题的研究，各项经济政策的制订，都要以这两大理论为依据、为指导。这两大理论的发现和论证，是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经济科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

三、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探索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系统研究，严格说来是在 1978 年以后。所探讨的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非公有制经济问题的研究

1979年，薛暮桥针对当时全国城镇待业人员已达2000多万，影响社会安定的实际情况，勇敢地提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广开就业门路的重要建议。他明确提出“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尾巴，可能利多害少。”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绝种，有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① 可以说，薛暮桥是在中国最早倡导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竭力主张体制外的经济成长，这是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公有经济面向市场、适应市场，推动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体制外经济成长就是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经济。1979年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几乎从零发展到1997年占经济总量的1/4，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成长最快、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大的一个群体。

（二）关于国有经济定位问题的研究

国有经济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在各方面颇有争议的问题。经济学界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国有经济应该收缩战线，集中于自然垄断部门、公益性部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而在竞争性领域，原则上国有企业应该退出来，让非国有企业去经营和发展。② 近几年来，在经济学界有争议的是，国有经济是否要控制属于竞争性行业中的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有经济控制的范围只限于“市场失效”的领域，而应从竞争性行业包括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退出。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民间资本不足，因而需要由政府动员和集中一部分资源发展重要的、需要大量投资、回收慢和风险大的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这是国有经济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功能。③

① 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② 见《收缩国有经济范围——刘国光访谈录》，《中国经济时报》1996年12月3日董辅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造国企》，《经济参考报》1997年8月7日。

③ 参见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三）关于国家所有制改革问题的研究

国家所有制的改革问题，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他们或者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或者提出，改革国家所有制在于实现国家所有制内部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使企业成为独立经营的商品生产者；或者提出，在存在国家的条件下，全社会所有就必然表现为国家所有，但在国有经济中可以实行双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国有制和部分的企业所有制；等等。①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改革国家所有制的具体设想，主张把分散在各部委（和各地方）的国有资本所有权职能集中在一个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由国务院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代表国家拥有国有资本所有权。然后由这一机构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关系，把国有资本的经营权授权给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也可以委托给众多的、竞争性和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经营活动的资本经营公司、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这些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以竞价投标的方式竞争国有资本的经营权，并独立承担代理风险。一旦这些公司获得代理权，它们就可以直接投资持股，取得利润，并以投入的资本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②

改革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攻坚战。国有制改革成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确立。因此，经济学界还需进行大胆探索，以求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四）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探索

早在 80 年代初期，就有经济学家提出，随着改革的推进，公有制将不只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出现许多形式，应该根据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还有的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样性概念，指出，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还不能“一刀切”和清一色，而应是一个多样性的复合结构，是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由集

① 见董辅礽：《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 年第 1 期 陈德华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企业自负盈亏》，《社会科学辑刊》1980 年第 4 期 汪海波等：《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症结何在》，《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2 期。

② 见张卓元：《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和资产重组》，《经济日报》1997 年 11 月 10 日。

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和其他公有制形式组成的，公有化程度由高到低的多层次、多阶梯的占有关系体系。[①] 从 80 年代中期起，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开始出现、发展股份制经济。这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其中，大量公有成分控股的股份制经济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一种公有制形式。 80 年代末,特别是 90 年代,各地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学家认为，股份制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这种作为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的股份制，不仅适应于国有工业企业的产权制度选择，也适应于土地产权制度的选择。 1989 年,陈东琪在《新土地所有制》中提出“土地合股制”，就是关于国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意义的早期探索。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肯定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一思想认识的飞跃有力地推动了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改革的进程。十五大后，有的文章列举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新的公有制形式有：股份合作制、社团所有制、租赁、委托经营、地方社团所有制、公有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乡镇村组所有制等。[②]

（五）关于国有企业产权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家注意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效率不高，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企业的产权关系不够清晰，对公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无人负责和关心。对于产权清晰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重要程度，则有不同的认识。许多经济学家特别重视产权改革，对如何推进产权改革却有不同的思路。张维迎主张产权应该普遍地落实到个人，国家应当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或者股权转变为债权。[③] 有人则主张除国有中小企业的所有权放开搞活外，对仍然需要国家控制的企业，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即实行由国家控股或者由多家国有投资公司共同持股，以建立政企分开的公司治理结构，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而林毅夫等人则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最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营造公

①见何伟：《社会主义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形式》，《人民日报》 1984 年 12 月 31 日；刘诗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见魏杰:《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理论根据与观念创新》,载王珏主编:《劳者有其股 ——所有制改革与中国经济论坛》，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 见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 ——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迫使企业适应市场、面向市场。产权改革并不是最重要的。①

所有制改革是深层次的经济改革，涉及所有制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重新探索，难度较大。特别是一些囿于传统经济理论的人，动辄挥舞起“私有化”的帽子吓人、批人，常使一些人裹足不前。所有制改革理论的进展，无疑将有力地推动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四、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探索

如果说以前有关社会主义分配的讨论仅仅涉及按劳分配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讨论，已经超出按劳分配的问题。这时，经济学家研究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按劳分配的实现问题、劳动力私有与按劳分配的关系问题。当然，劳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商品的问题，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卫兴华不同意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的说法，② 而张问敏、何伟、韩志国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具有必然性，让劳动力作为商品自由流动，不但不违背按劳分配原则，恰恰相反，它正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借以实现的条件和形式。③ 1988 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上，谷书堂等提出在现阶段，在收入分配方面除了要实行按劳分配外，还要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以确认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创造方面的贡献，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④ 这一观点提出后，曾经遭到有的经济学家的非议。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市场经济中通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主张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 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对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给予肯定。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是不是要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

①见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见卫兴华：《简评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论》，《光明日报》 1986 年 9 月 27 日。

③见张问敏：《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思考》，《经济研究》 1987 年第 2 期；何伟、韩志国：《试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全方位开放》，《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 2 期。

④见谷书堂等：《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